

上海市重点学科
(传播学)建设项目

青年传播学者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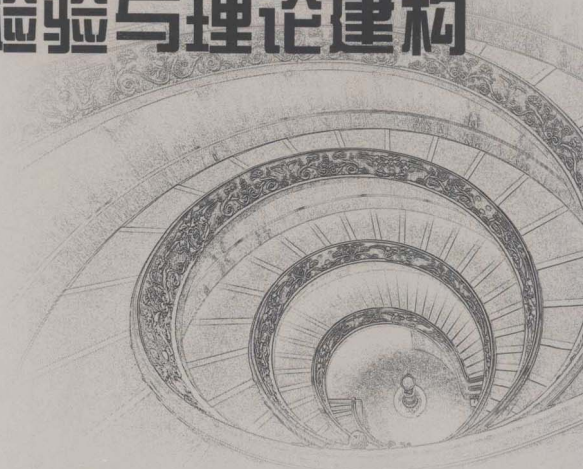
赵士林

著

传播学实证研究

——假设检验与理论建构

CHUANBOXUE SHIZHENGYANJIU —— JIASHEJIANYAN YU LILUNJIANGOU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资助

传播学实证研究

——假设检验与理论建构

赵士林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围绕概念化、研究问题和抽样技术这三个核心概念,探讨了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过程和特点。概念只是人类用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和描述的符号,本身并没有内在的意义,因此达成共识是一场艰辛的对话。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既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又要突破前人的研究。作为一种开拓型研究,传播学实证研究突破的方式包括引进新的解释框架,引入新的变量,或者干脆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等。传播学实证研究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样本的代表性问题,而抽样理论与方法是其中的关键。

研究案例的讨论涉及传播学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这两种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具体的研究主题包括农民工形象及媒介接触、环境类、食品安全类及公共安全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国国家形象和上海城市形象,所有这些研究都被放在危机传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学实证研究:假设检验与理论建构/赵士林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明天文库.传播系列)
ISBN 978-7-313-08170-4

I. ①传… II. ①赵…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076 号

传播学实证研究

——假设检验与理论建构

赵士林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mm×960 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67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8170-4/G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4742979

序

我和士林博士是校友，也有师生之谊。10多年前，我们几乎同时选择了上海大学新闻系“继续教书”这个站着说话的职业。江苏有句方言：“站着说话腰不疼”，形容只说不做不知做的辛苦。其实，当教师“站着说话”腰很疼！对于我，深有体会；对于士林博士来讲，也应该有体会。他本科学化学，硕士、博士读新闻传播，这个转型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挑战，我当时是怕他转不好。但他却转过来了，并且转得很快，我认为他天资好又勤奋。最近几年，我负责抓学院的学科建设，总希望他多出成果，他总是说“我抓紧”。我知道他做研究总是想做与众不同的。别人一年磨几剑，他是一剑磨几年。这本《传播学实证研究——假设检验与理论建构》是新“剑”，文字不多，像读书笔记，却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如他在分析《传媒的四种理论》中所提到的“威权主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都不是“理论”，而是“范式”，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基本假设包括：关于个人的假设；关于国家的假设；关于人与国家关系的假设；关于知识和真理的假设。有些观点虽然我也曾提出，但我讲传播学近30年，都是作为“理论”而不是“范式”来分析。他还提出，《传媒的四种理论》主要是从“政治制度”或者“意识形态”的不同来区别不同的媒体体系，从范式的角度，又可以把这四种理论简单分为“集体主义范式”和“个体主义范式”。其中“威权主义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属于集体主义范式，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强调集体、组织及

国家的重要性。“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则属于“个体主义范式”，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他在分析传播学实证研究时指出，实证研究基于对“社会事实”的信仰，是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使得社会科学区别于哲学和心理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自己解释社会事实的一整套观点和方法。不管“测量技术”如何发达，因为传播学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现实性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一些核心的概念还是会因为价值分歧而无法达成共同的测量标准，但是研究的结论至少在“特定的测量”中是具有解释能力的。在士林博士文字不长的论著中，类似的研究还较多。

我欣赏士林博士读书做研究的务实态度和问题意识，在他的新书出版时写了以上文字，以互勉！

戴元光

2012年春于沪上

前 言

传播学实证研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也是一条艰辛之路。本书是笔者对自己1999年以来传播学教学和实证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因此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和读者分享自己研究过程中的感受、困惑和思考,而不是提供一个结构和体系完整的理论框架或者方法指导。

实证研究过程中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对“事实”和“证据”的近乎偏执的信仰。作为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延伸,这种信仰使传播学实证研究充满科学的魅力,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客观性和规范性是传播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目标,也是传播学能够获得学科和学术地位的基石。价值无涉如同传播研究的“理想国”,要求研究者坚持把价值中立和客观性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价值无涉要求研究者意识到“他者的存在”并保持宽容开放的态度,中立地观察现实世界,并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摒弃个人主观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种客观性,仅仅要求研究者的自觉是不够的,实证研究更多是一种方法。传播学实证研究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通过不断发展对概念的“测量技术”来规避价值多元导致的“应然性”的争论,集中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尽管有些概念还是会因为价值分歧而无法达成共同的测量标准,但是研究的结论至少在“特定的测量”中是具有解释能力的。人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就可以就“测量标准”进行不断的补充,或者直接对过往的“测量标准”进行改造和批判,寻找其中可以“共享”的意义。

因此,实证研究“作为一种信仰”和“作为一种方法”是同等重要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假设检验和理论建构的循环往复就是实现这种关系良性发展的基本方式。实证研究要求有科学的方法,也要有理论支持。理论可以为我们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提供逻辑的解释,可以指出新的可能的解释模型,也可以为研究指明探索的领域和可能方向。

在这里,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我们观察外部世界的一面镜子。对于同样一个社会事实,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原因是我们观察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这些截然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就是特定的范式。范式作为思考的背景尽管是隐含的、难以觉察的,但是却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基本假设,为人们的观察和思考规定了特定的对象、方向和立场,是“我们用来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是参考框架”。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大众传媒,而媒体相关的研究问题和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往往具有高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从事传播学实证研究往往要面对价值悖论:一方面,实证研究要求研究“价值无涉”,保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另一方面,传播学实证研究中最有价值的研究领域,恰恰就是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领域。在涉及传播制度、民主和自由、战争宣传及国家主权、文化和宗教等问题时,我们又很难走出各自的“圈子”,无法摆脱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无法实现超越的客观性。

作为一种开拓型研究,传播学实证研究者对于“传播事实”有自己特定的认识,并通过假设—演绎—检验这种不断循环的研究过程来探索事实,发现规律。变量语言、概念化和抽样的技术、标准化的研究程序、共同的数据处理技术,使得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强的科学性。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和社会文化中对“重要的假设”进行再检验,可以就研究假设不断补充新的变量,进而发展自己的理论。假设—演绎的过程使得我们可以运用各种不同的竞争理论来解释同一个传播现象,而检验的过程又使得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被“证伪”。

一个好的传播学实证研究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提出研究问题?如何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经常思考的问

题。一个好的研究,首先要寻找突破点。不突破前贤的观点、学说和方法,只是重复,就会无所作为。好的研究问题往往需要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而同一个传播现象背后可能有两个逻辑上都成立的理论解释,由于惯性的作用人们往往受到某一种解释的影响并视之为“真理”,但是新的证据又可能打破这种平静并发展新的解释和新的理论。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在质疑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研究者在确定自己的研究问题前,需要阅读大量文献,了解相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汲取别人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之上如果研究者能够发现以往研究中忽视的现象,或者引进新的变量,或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者测量方法,就可能闯出一条新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可否定的,研究过程中各种理论在研究者的脑海中都处于“悬置”的状态,即待命状态。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研究者脑海中的不同的理论被充分调动起来,在不断的尝试中去寻找“最佳”的解释框架,并依赖研究者的眼光、经验及证据不断完善或者修正这种解释框架。正是在这样的激荡和交锋中,传播学的研究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大众传媒被看作是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整体认知的重要力量,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囚徒理论”,到了李普曼则发展为“拟态环境”。大众传播媒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认为,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媒介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本书中的实证研究案例涉及弱势群体、突发环境事件、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及国家形象等热点话题,所有这些研究都被放在一个风险社会和危机报道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赵士林

2012年春

目 录

第一章 传播学研究的范式与理论	1
第一节 传播学研究的范式	1
第二节 传播学研究的理论	9
第三节 传播学研究的效果理论	15
第二章 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与技术	34
第一节 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	34
第二节 概念化、指标化和测量	39
第三节 问题意识和抽样技术	44
第三章 危机报道的相关文献	53
第一节 危机报道的基本定位	53
第二节 现代危机的特点	58
第三节 现代媒体危机报道的基本要求	63
第四节 媒体危机报道的基本功能	72
第四章 内容分析法——案例与分析	87
第一节 上海媒体春运报道中的农民工形象	87
第二节 中国媒体突发环境事件报道的框架转变	94

2 传播学实证研究——假设检验与理论建构

第三节	省级报纸食品安全报道研究	132
第四节	新疆“7·5”事件报道的话语分析	159
第五章	问卷调查——案例与分析	178
第一节	外国留学生脑海中上海形象的影响因素研究	178
第二节	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196
第三节	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210
参考文献		222
后记		225

第一章

传播学研究的范式与理论

诚如巴比在《社会研究方法》一书中所说：“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论和研究、逻辑和观察、归纳和演绎——以及其他被称为范式的基本参考框架的相互激荡。”社会科学的理论是一面镜子，可以为我们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提供逻辑的解释。对于同样一个社会事实，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原因是我们观察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这些截然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就是特定的范式。范式作为思考的背景尽管是隐含的、难以觉察的，但是却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基本假设，为人们的观察和思考规定了特定的对象、方向和立场，是“我们用来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是参考框架”。

传播学理论的主流是效果理论，由于传播学研究自身的“问题取向”和“关注现实”的特点，效果研究的理论成果琳琅满目，并依然处在不断地发展之中。

第一节 传播学研究的范式

“范式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观察的方式，它们只有用处上的大小之分。我们将要考察的每一种范式，都为关注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关于社会事实的假定。我们将会看到，每一种范式都能够敞开新的理解，带来不同类型的理论，并且激发不同类型的研究”^①。按照科学史学家 T. S. 库恩的观点，一门学科若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说明这一学科仍处于“前科学”阶段。有人据此认为，社会学的派别林立以及方法论的多样性是这门学科尚未成熟的标志。

^① 巴比，著. 社会研究方法[M]. 邱泽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4.

但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尺度去衡量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知识模式,它根据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模式。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逐渐普及,以及多变量统计分析和资料搜集技术的发展,实证研究的方法及其定量化程度日益接近科学化的准则要求。但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却无法消除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分歧与困境。确实,自社会学产生以来,建立统一范式的企图无不遭到失败,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没有哪一个学派能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尽管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和理论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是试图建立整合理论的努力也从来没有被放弃。作为范式的代表作品,《传媒的四种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

传播学研究中开比较研究先河的《传媒的四种理论》中所提到的“威权主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都不是“理论”,而是“范式”,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基本假设包括:关于个人的假设;关于国家的假设;关于人与国家关系的假设;关于知识和真理的假设^①。

《传媒的四种理论》主要是从“政治制度”或者“意识形态”的不同来区别不同的媒体体系,从范式的角度,我们又可以把这四种理论简单分为“集体主义范式”和“个体主义范式”。其中“威权主义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属于“集体主义范式”,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强调集体、组织及国家的重要性。“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则属于“个体主义范式”,其核心观点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并认为个人的主体性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传媒的“集体主义范式”

威权主义理论是所有理论中影响时间最长、影响人群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一种传媒理论。根据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威权主义简单分为“古典威权主义”和“现代威权主义”两个阶段。美国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 A. 珀尔马特对威权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威权主义有早期威权主义和现代威权主义之区别,前者是少数人以少数人的名义实行的统治,后者是少数人以多数人的名义实行的统治。现代威权主义具有集体性特征,是“大众运动”的威权主义。在此基础上,珀尔马特把威权主义分为五种模式:布尔什维克式的、纳粹式的(指纳粹德国)、法

^① 有关“报刊四种理论”的论述参见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西斯式的(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和南欧的一些国家)、社团式的和执政官式的^①。

(一) 古典的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报刊理论强调大众传媒为君主、政府和国家服务,强调政府的权威和传媒控制,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传媒不得挑战和诋毁统治者。威权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① 集体(团体)比个人重要;② 国家是神圣的,不证自明的;③ 真理掌握在少数聪明人手里;④ 需要通过引导或者控制实现思想的统一。

威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他们分别从“智者统治”、“统治权术”、“个人的自私和堕落”、“国家的神圣性”等不同方面为威权主义添砖加瓦。

作为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作为一个雅典广场自由辩论的拥护者,作为一个深切感受到坏人诬告的可怕后果的学生,柏拉图在思想上却推崇哲学家统治。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极端美化贵族政体。他认为,人的本性(包括他的物质利益与私欲)会使政府从贵族政体降低为富阀政体,降低为寡头政体,降低为民主政体,降低为暴君政体。他认为,国家只有掌握在聪明的哲学家手中才安全,这些人受道德权利的约束,而又用这种权利来约束社会基层分子。根据柏拉图的“囚徒理论”,广大的社会基层分子根本无能力认识“真相”和“真理”,只有那些掌握真理的哲学家为国家树立统一的政治和文化目标并付诸实施,才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唯一正确路径。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其代表作就是引起很大争议的《君主论》。如果说柏拉图认为理想国需要聪明的哲学家,那么在马基雅维利的眼里,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深谙权术的伟大君王,而《君主论》就是自己“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一个经典作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殚精竭虑地为君王出谋划策,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实现统治和征服的手段、技巧及策略。

霍布斯作为英国著名的威权主义哲学家,关注王权与国会的冲突。霍布斯代表作《利维坦》,强调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地位,特别强调个人欲望的危险性及控制信息传播的重要性。霍布斯认为人性自私自利、残暴好斗,为了“免除痛苦”和“获取

① 参见冯秀文,《世界政治史研究中的威权主义及其历史定位——以拉丁美洲为例》[J],《世界历史》,2005(2)。

权力”，人的自然状态是人人自危的普遍争斗状态。为了避免战乱，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反抗暴政的权利，去服从绝对君主制的绝对权威。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被认为是现代集权主义政治学说的主要代表人，强调的是个人的群体属性，其重要的特征是强调国家神圣性，主要观点包括：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国家是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国家是自在自为的理性；真正的自由是国家内的自由；公共问题、国家事务是少数国家成员考虑的事情。

报刊威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权威性，通讯工具作为国家的奴仆，也必须受到国家的严密控制，无条件地为国家的最终目的服务。与强大的国家迷信相对应的是君权神授，在威权主义社会里，国家就是特定的统治者和君主，他们理所当然成为国家的代言人。威权主义理论强调个人在哲学上需要服从执政者，因为这些执政者能够做出对社会最有益的选择，如果个人自行其是，就会迷失方向，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报刊威权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① 报刊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的最终目的服务；② 报刊必须掌握在聪明的执政者手中；③ 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严格控制信息大量的传播；④ 报刊不能批评掌权者或提出异议；⑤ 政府有权对出版物进行控制和检查。

（二）现代威权主义

现代威权主义中以希特勒为代表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国家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更多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纳粹德国的国家理论包括：强调种族主义，盲目崇拜国家领袖，不容异见，思想单一，以及最重要的观念——一个人通过国家获得自我满足”^①。

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现代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其重要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由列宁、斯大林而发展的一套独特的传播媒体理论。其中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一个主要特点是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尤其是大众传媒）来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改造，实现了比古典威权主义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社会动员。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论这两层含义。在哲学层次上，马克思在认识起源问题上摒弃了先验论的假设，强调经验事实先于理论而存在，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主张以现实的“市民社会”和人的活动作为哲学思考的重心。在研究方法的层次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研究过程的经验性与实践性，强调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

① 西伯特，等. 传媒的四种理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

侧重分析社会结构及各个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样一个总体态度的影响下,马克思认为社会变迁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社会变迁的动因是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力的变化,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的报刊理论,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领导工人报刊和党的报刊的新闻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各个侧面总结和论述报刊的党派倾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莱茵报》期间,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在《论报刊的检查制度》一文中,曾高举“出版自由”的大旗,提出过“人民报刊”的思想。可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进程,备受迫害和流浪之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看清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同盟——的非正式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时,指出了报纸的党派性。该报在给一位读者的公开信中指出,“它是一份彻头彻尾有党派的报纸,如果有人认为它是无党派性的,那是对它的最大侮辱”。

苏联的报刊理论,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夺权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首先,列宁开始创建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建党。在其后的斗争过程中,报纸也一直是作为斗争的工具存在的,因此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报刊的一个重要表现。1903年,列宁在《给同志们的信》中呼吁成立党内多数派机关报,捍卫党性;1905年,其又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提出“党的出版物”的概念。从归属形式上看,苏联的新闻传媒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如《真理报》、《列宁格勒真理报》等。按照规定,所有的机关报刊都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总编辑由同级党委任命。第二类是各种群众团体的报刊、专业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如消息报,塔斯社等。按照要求,它们也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斯大林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建国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国家的主要矛盾,导致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和个人野心的膨胀,严重妨害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为后来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传媒的四种理论》把苏联报刊的社会控制特点概括为: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②报刊是阶级的工具;③报刊是党的路线的发言人和国家的工具;④报刊的自由和责任密不可分。应该说,《传媒的四种理论》对苏联报刊理论的分析是充满偏见的,甚至有许多臆想的贬低的语句,如“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们是不稳固的和狂热的”。在这里,资产阶级新闻学者已经把新闻和意见混为一谈,忘记了自己所标榜的客观公正的原则。应该说,各个阶级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同一种现象的分析结论可能相差悬殊。尤其是涉及传播控制和新闻自由领域的许多问题,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问题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新闻控制和反控制斗争的内容。

二、传媒的个体主义范式

作为传媒的个体主义范式,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是其中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更强调消极自由,强调表达自由和“意见的自由市场”,强调媒体免于政府的控制和影响。社会责任理论更强调积极自由,强调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应该遵循平衡、公正、客观、全面的报道原则,为公众提供更充足的信息。

(一)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从弥尔顿到密尔

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在16世纪积累了经验,在17世纪发展出了哲学原则,在18世纪将这些哲学原则付诸实践。其中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的开辟开阔了人的思想,冲破了神学的宇宙观,增强了人对人类“理性”的信息。个性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西方的自由主义积累了初步的力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宗教改革促进了论辩的发展,培养了人们自己做判断的习惯。而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出现,导致了自由契约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并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观念。一大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出现,则是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直接动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英国政论家的约翰·弥尔顿、哲学家约翰·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

《论出版自由》作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早期代表作,实际上是弥尔顿针对当时的英国国会议员的非难而提交的一篇演说词。作为英国的伟大诗人和政论家,弥尔顿这本于1664年发布的政治小册子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作品之一。美国学者席伯特指出:现代自由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则——“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就是从弥尔顿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弥尔顿的基本论点是:出版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真理必须与谬论的斗争中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真理在圣经中被比为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潭”。

约翰·洛克的观点与弥尔顿的观点一脉相承,他的主要观点表现在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中。他的政治哲学认为权力的中心在于人民的意志,政府不过是受委托办事的人,人民赋予政府权力,同时也可以撤回这种权力。孟德斯鸠于1748年写成《论法的精神》,特别抨击了以言论罪的封建专制。卢梭的基本观点与

洛克相同,他于1742年发表《社会契约论》,其核心观点是:主权在民,人民可以订约,也可以解约,人民有革命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实践上,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杰斐逊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深受当时报刊的诋毁之苦,但他坚持自己的信仰。经过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斗争,到18世纪,报刊就完全从集权主义制度过渡到自由主义制度。到18世纪末,自由主义原则体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宪法条文中,成为一个新的神圣准则。

19世纪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弥尔顿遥相呼应,阐述了“表达自由”的四个基本观点:第一,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如果压制了某种观点就等于压制了真理。第二,一个错误的观点可能包含达到真理所必需的那一点点真理。第三,即使人们通常接受的观点是全部真理,他们也习惯于将这种观点作为一种先入之见而不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对它加以掌握,除非他们被迫要维护这一真理。最后,通常被接受的观点如果不一次次地与其他观点论辩,就会失去活力,失去对人们行为和性格的影响力。

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有:①人是理智的动物,人们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②政府有可能犯错误,应该受到监督;③任何人拥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及讨论的权力;④应允许意见自由市场的存在,真理能够战胜谬论。

应该说,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响亮口号,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热情,动摇了封建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由于理解混乱,自由主义迷失了自我,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困惑。一方面,资本的特权代替了政府的权力,人民的意愿在运行经费昂贵的现代媒体面前朝不保夕;另一方面,追求利润的原则导致了煽情新闻泛滥,黄色报纸蔓延;最后,垄断扼杀了意见的自由市场。

(二) 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积极自由的概念

社会责任论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一批学者建构,20世纪50年代被西方大多数国家接受,并逐步取代自由主义理论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主导性理论。对于社会责任理论做出特别贡献的是“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这个由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钦斯领导的13位“其资质无可挑剔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为传媒的“社会责任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这一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我们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